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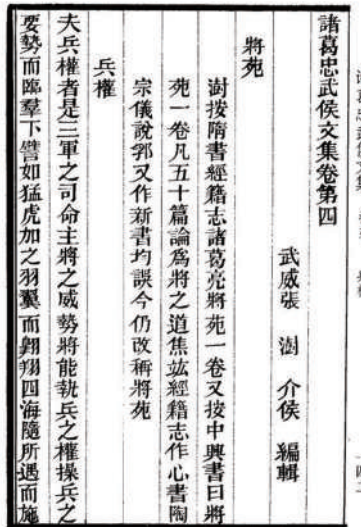
《将苑》是中国较早专论为将之道的兵学典籍。全书共 50 篇,约 5000 字,内容一事一议,言简意赅,系统阐述了将帅应具备的品质修养和军事素养,明确了治军的核心原则与带兵用兵的相关方法,也指出为将者应当警惕规避的各类弊病,在古代将帅素养培育与治军实践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

《将苑》

论为将之道

■ 任晓宁

明治军要义



《将苑》高度重视将帅的作用,将将帅的素养与国家安危紧密关联,提出“古者国有危难,君简贤能而任之”,主张国家面临危难之时,必须选拔贤能的将帅承担重任、保家卫国。与先秦部分兵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,《将苑》秉持“先仁义而后智勇”的导向,将仁、义等道德品质置于智、勇等能力要素之前。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,书中明确提出将领应当“不为利挠”,坚守道义准则,做到见利思义。如果将帅能够对部众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而知其饥寒,察其劳苦”,便符合“仁将”的标准。

在治军层面,《将苑》强调要严明赏罚制度,提出“禁令刑罚,所以威心”,通过严格公正地执行军令刑罚,让士卒心生敬畏,以此树立统帅的权威。同时,该书也高度重视奖赏的作用,主张对阵前奋勇杀敌的将士论功行赏,做到“尊之以爵,赠之以财”,更要落实“小善必录,小功必赏”,哪怕是微小的善行与功绩,都要及时记录表彰。

此外,《将苑》十分看重重军队的教育训练,在《习练》篇中明确提出“即戎之不可不教”,强调必须常态化开展士卒的教育训练工作。一方面要向士卒“教之以礼义,诲之以忠信”,引导士卒明晓礼义、恪守忠信,提升对军队与国家的忠诚度;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基础军事技能训练,让士卒熟练掌握阵形分合、行止进退等各类战术动作。

《将苑》素有“古代将帅教科书”的美誉,自明清以来被兵家广为刊刻流传,是历代武将修身研习、地方督抚选拔教官时的重要参考典籍。书中蕴含的“德才兼备”的为将理念,对新时代指挥员的培养仍具有重要意义:军队选拔指挥人才,既要严格考察专业指挥素养,更要把军政治品德关口;考察干部时也要多方面综合衡量,全面检验其担当精神与临机应变能力,以此持续推进高素质军事人才队伍建设。

烽火岁月里的铁纪荣光

——从几则抗战故事中品读制胜之道

■ 周 一

1931年9月18日,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,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。1937年7月7日,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,并于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,接着沿平绥、平汉、津浦3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,企图以3个月时间“灭亡中国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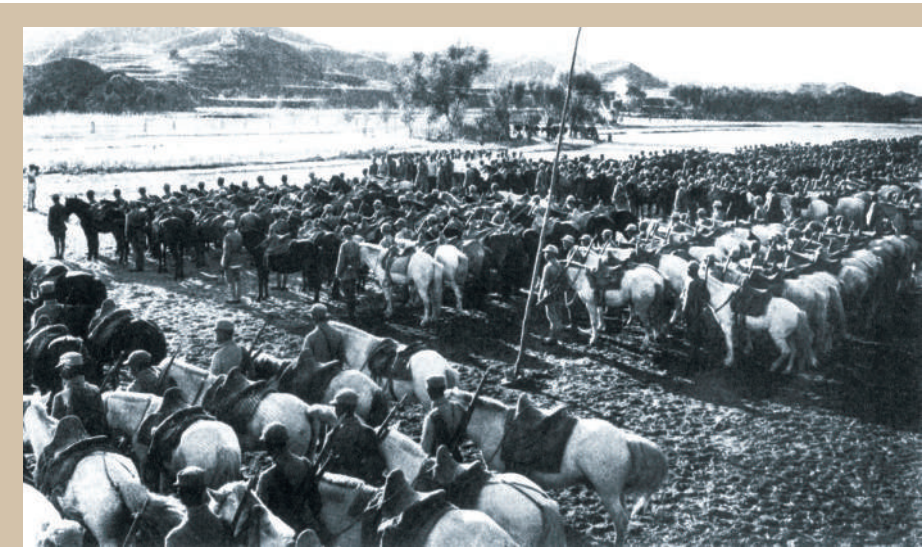
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,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,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,倡导建立并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把无数爱国力量紧紧凝聚在一起,成为支撑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。从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游击战争,到敌后战场的持久抗战,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广大抗日军民,以钢铁般的意志浴血奋战,最终在1945年9月迎来了日本侵略者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历史时刻,夺取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。

回望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,人们总会追问: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、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条件下,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保持高度团结统一,能把千百万群众动员起来、组织起来,能在一次次艰难考验中不断发展壮大,最终带领人民战胜强大的侵略者?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,就是党在抗战中始终坚守严明的纪律,用铁的纪律锻造出了一支打不垮、拖不烂的先锋队队伍,为赢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。在此,我们选取抗战期间党领导人民军队坚守作战纪律、群众纪律、组织纪律、廉洁纪律的几则故事,一同感悟其中蕴含的制胜力量。

南征北返再“长征”

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的第一条,就是“一切行动听指挥”。要评判一支部队的纪律是否过硬,最根本的一条标准,就是看它能不能严格落实指示、坚决执行命令。1941年,八路军第359旅按照中共中央和总部的指示,进驻南泥湾,守卫边区重要的南线门户。面对十分困难的生存条件,全旅官兵喊出“一把镰头一把枪,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”的口号,一面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作坚决斗争,一面展开大生产运动,把处处荒山的南泥湾建设成远近闻名的“陕北好江南”。

然而,就在抗战形势逐渐好转,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逐渐掌握战场主动之际,中央决定以第359旅为主组成南下支队,执行南下作战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任务。对于第359旅来说,离开南泥湾,不仅意味着舍弃亲自亲手建设多年的垦区家园,更可能面对没有稳定给养、缺乏友军直接支援、没有稳固后方的艰险环境,后续的抗日斗争将变得十分残酷,甚至有遭遇重大损失的风险。面对这一艰巨任务,全旅官兵不发声骚、不讲条件,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,以开荒南泥湾时的坚定意志和豪迈气魄欣然领命,加紧做好出征南下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

上图:整齐列阵的八路军骑兵队伍。
右图:八路军第359旅开垦南泥湾。

资料照片
资料照片

1944年11月,南下支队告别延安,踏上南征征程。一路上,他们强渡黄河、汾河,先后跨越敌军严密把守的同蒲铁路、陇海铁路,与日伪军多次激战,历尽艰险,终于在1945年1月进入豫鄂皖边区,与新四军第5师胜利会师。随后,南下支队短暂休整后,按照既定计划挺进湘北,进驻平江地区,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政策,团结一切爱国人士,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,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。这一深入敌后的战略行动使敌顽大为惊恐,国民党反动派纠集重兵对南下支队实施疯狂“进剿”,在平江、浏阳一带夹击我军。危急之下,部队官兵发扬老红军传统,分散主力、深入群众,以灵活的游击作战在鄂南、赣北、湘东等广大区域内开展斗争,艰苦战斗数月,巩固和拓展了湘鄂边抗日根据地。

直到1946年10月,第359旅主力才胜利返回延安。在这次南征北返的过程中,国民党顽军10余万人,在2000多公里的范围内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。全旅官兵严守政治纪律,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,不怕牺牲、勇往直前,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深入日伪、蒋顽纵深腹地地带纵横驰骋,辗转2万多里,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使命,被誉为“第二次长征”。

一河之隔两天地

1937年8月下旬至9月间,八路军东渡黄河,奔赴抗日前线,其中一部挺进到晋北忻县、代县一带后,立即开展抗日宣传,广泛发动群众。当时,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,我军驻上村,国民党部队驻下村,两村隔河相望,双方按约定互不干涉,各自整军备战。

没过多久,不断有下村的村民跑到上村来,不少人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。原来,国民党军进驻下村后,立刻横征暴

敛,表面打着“抗日”旗号,向各家各户摊派“慰劳费”“抗战捐”,实则借机搜刮民脂民膏,旧军闸作风丝毫不改。遇到交不出摊派的村民,他们直接破门入户翻箱倒柜,甚至把老百姓的桌椅板凳拆了当柴烧,弄得当地百姓苦不堪言,只能背井离乡,逃到河对岸的上村谋生。反观仅一河之隔的上村,却是一派全新气象,和下村的乱象形成鲜明对比。八路军进驻后,立刻派出多个工作组,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军队群众纪律,不仅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各类生活困难,还公开号召老百姓监督部队官兵言行,一旦发现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,查实后绝不姑息。

征兵的时候,上村八路军的征兵点前人头攒动,前来报名参军的群众络绎不绝,门口常被挤得水泄不通;下村国民党军的征兵点前,即便想尽各种办法征集兵员,主动报名的人也寥寥无几。无奈之下,国民党军只能靠金钱收买兵员,先是让各保长挨家挨户游说,散布“国军是正牌军,票子多”“八路是穷光蛋”的不实言论,后来干脆明码标价,喊出“40块大洋一个兵,当面交现款”的口号。即便如此,当地群众早已对国民党军侵害百姓的种种行径深恶痛绝,根本不为这种“花钱买兵”的做法所动,纷纷表示“大洋买不了我的心”,转而全力支持八路军的抗日行动。

党内不容有“特殊”

抗战全面爆发之后,延安成为全国人心所向的抗日红色中心,全国各地大批有志青年、爱国知识分子冲破重重封锁慕名而来,从这里投身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。但随着队伍不断发展壮大,党员、军人的出身背景、思想认知也愈发多元复杂,部分同志对党和军队纪律的认识、理解和执行存在偏差,滋生出一些自由散漫的思想和行为,刘力功就是其

中一个典型代表。

刘力功是众多奔赴延安投身抗日的进步知识分子之一,刚来的时候表现良好,并先后在抗大和党校学习深造。学业结束后,党组织结合他的思想表现、工作经历、学习情况和抗战实际需要,决定安排他前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事基层工作。但刘力功自视理论水平较高,又怀有怕苦畏难情绪,拒绝去基层锻炼。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对此事高度重视,刘力功所在的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,耐心开展说服教育、讲明利害关系,但刘力功始终执迷不悟,拒绝执行党的决定。最终,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,并公布于全党。

事后,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在作《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》的报告时严肃指出:“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,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,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,就不能胜利。”报告着重强调遵守党的纪律的重要性,明确指出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遵守纪律的“特殊人物”“特殊组织”。在随后开展的大讨论中,延安的干部、党员深入剖析自身、查找思想问题,延安也逐渐出现了广为人知的“三多三少”新气象: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,讲个人特殊要求的少了;主动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,贪图安逸、攀比享受的人少了;自觉遵守纪律的人多了,自由散漫现象少了。铁的纪律得到广大党员的自觉践行,党和人民军队的凝聚力、战斗力也随之得到极大提升。

只见公仆不见官

抗日战争时期,陕甘宁边区既是党领导全国革命和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,也是人民军队巩固的总后方,更是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重要地区。全面抗



链接历史

放の日伪军,减轻先期渡河主力部队的压力,突击队临时改变原定转移路线,直插澄南敌占区纵深,计划迂回向澄西方向靠拢。次日下午,在马家村隐蔽休整的突击队,被尾随而来的日伪军团团包围。经过数小时激烈巷战,突击队战士伤亡大半。陈新一率领剩余的战士,跃入马家村北村的红菱塘,试图涉水越塘突围。追至塘边的日伪军向红菱塘疯狂扫射,满塘青绿色的菱叶瞬间被鲜血染红。这场突围战斗中,突击队除4名战士成功突围外,包括陈新一及其未婚妻、时任常山县委妇部长朱爱爱在内的其余人员全部壮烈牺牲。

在强渡南横套河时,熟悉当地情况的包厚昌主动留下,搜寻曹德辉等失踪指战员。在搜寻无果的情况下,包厚昌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跳出敌人包围圈,在当地群众的拼死掩护下就地隐蔽,陆续收容了20余名失散的战士和伤员。一周后,包厚昌带领他们转移到中兴乡西五节桥,猛将堂一带,随后借夜色悄悄转移,最终安全抵达苏中。

血战南横套是沙洲反“清乡”斗争中一场极为惨烈的突围战。新四军指战员以弱抗强,虽付出巨大牺牲,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,有力挫败了日伪围歼沙洲新四军主力的企图,保存了新四军第6师第18旅警卫1团的骨干力量,为苏南东路反“清乡”斗争的长期坚持和后续恢复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80余年过去,南横套河水依旧向东奔流,徐家高桥也已几经重修。但这段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从未走远,英雄们的忠勇事迹始终在江南大地代代相传。

南横套河见证:夜幕下的血色突围

■ 李颖硕 张 苗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。同年11月上海失守后,江阴、常熟等地相继沦陷。日军随即侵入沙洲(今江苏省张家港市),所到之处烧杀淫掠、疯狂洗劫,制造了多起惨案。

民族危亡之际,新四军东进苏南,点燃了敌后抗日烽火。1940年初,江南抗日义勇军在沙洲设立办事处,收编改造地方武装,凝聚抗战力量。1941年2月至3月,沙洲县抗日民主政府、中共沙洲县委员会相继成立。之后,沙洲地方抗日武装以沙洲江防卫队为基础,整编组建为江南保安司令部警卫1团,直属新四军第6师领导。

1941年7月,日伪开始实施“苏州地区第1期清乡”。在沙洲境内,日伪军先后设立430余处据点,挖沟筑墙、封锁交通,疯狂搜捕抗日军民,企图切断南北抗日通道。

新四军第6师派出警卫1团挺进沙洲,会同县委、抗日民主政府带领党政军民全面开展反“清乡”斗争,广泛发动群众拆除封锁竹篱、打破敌人交通封锁,以游击武装袭扰日伪据点,接连重创来犯之敌。8月,苏南东路反“清乡”形势急剧恶化,新四军在沙洲的主力部队奉命

分批北撤。

9月下旬,为保卫沙洲战略要道,扭转反“清乡”被动局面,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政委温玉成、保安司令部警卫1团政委曹德辉率新1连、新3连渡江潜入沙洲,与警卫1团政治部主任包厚昌率领的武工队会合,开展反“清乡”作战。

部队进入沙洲后,连续多日遭日伪军多路围追堵截,辗转转战过程中电台意外遗失,与第6师主力失去联系。为保存有生力量,温玉成果断下定决心,命令部队沿长江岸线快速向西转移。途中,部队接连击退数股日伪军的封锁拦截。转移至大新新海坝时,先头部队突遭日伪军猛烈攻击。指战员们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就地展开反击。

通过望远镜观察,来犯日伪军兵力超过400人,而我军兵力有限,又处于开阔沙地的不利地形。温玉成反复权衡后判断,白天无论向哪个方向突围,部队都会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,难以组织有效反击。最稳妥的战术选择是就地挖掘临时掩体,坚守阵地4个小时,待夜幕降临后再伺机向澄西方向突围。

连续打退日伪军5次冲锋后,夜幕悄然降临。此时,从常熟县城驰援而来

的日伪军增援部队已经逼近,敌人的合围圈即将完全收拢。

千钧一发之际,温玉成、曹德辉紧急进行战斗动员,迅速组建一支以党员为骨干的40人突击队,由警卫1团参谋长陈新一统一指挥,承担开路突围任务。

受领任务后,陈新一带领突击队员实施抵近侦察,查明了敌人封锁线上的薄弱地段。队员们贴着地面匍匐前进,悄无声息推进至距敌阵地约30步的位置。陈新一一声令下,数十枚手榴弹同时投向敌阵,突击队员们如猛虎下山般一跃而起,勇猛突入敌阵,与敌人展开近战。硬生生在严密封锁线上撕开一道狭窄缺口,主力部队随即带着伤员和地方干部顺着这道缺口快速突围,跳出敌人的合围圈。

9月26日夜,部队转战至后厍镇以东的徐家高桥。桥下是河面开阔的南横套河,当时正值秋季大潮汛,江水倒灌涌入,河面波涛滚滚,漩涡四伏,而连通两岸的徐家高桥木桥早已被日伪军拆毁。身后追兵渐近,形势刻不容缓,温玉成、曹德辉当即命令部队及随队地方干部立即泅水渡河。指战员们刚踏入河中,就被徐家高桥据点里的日伪军发现。据点